“习近平的地缘战略将带来难以计算的好处”

——外国政要和媒体眼中的习近平

□ 本报特约记者 柯 岩

俄罗斯“伊兹博尔斯克俱乐部”秘书长、《明日》周报副主编、历史学副博士亚历山大·纳戈尔内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成为整个欧亚大陆——从太平洋沿岸到大西洋沿岸发展的基轴，显示了中国新的、主要的作用”。“习近平的地缘战略将带来难以计算的好处，其规模，我们的专家包括国家机构还没有做出恰当的评估。”

“‘一带一路’构想堪称人类历史上第二次地理大发现”

2015年3月30日《人民日报》一篇文章引述俄罗斯亚洲工业企业家联盟政策咨询部主任格里高利·特罗菲姆丘克的话说，“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更让人们看到亚洲地区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长远前景。中国作为亚洲地区的领头羊，正带领各国一同寻求正确的发展道路，俄罗斯也将积极参与其中。

2014年4月11日《印度教徒报》网站发表新加坡南亚问题研究所研究助理拉吉夫·兰詹·查图维迪题为《复兴“海上丝绸之路”》一文，称中国正在经历“邓小平时代2.0版”。对于通过大胆创新的方式调整中国的全球姿态，中国的新领导班子抱有相当乐观的态度，而其中关键的要素就是通过对外合作打造一个经济体系。复兴“海上丝绸之路”无疑就体现了这种创新手段。具体地说，“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成功将对地区稳定与全球和平产生重大影响。大力推动复兴这条古老的海上航路是中国新任领导人提出的第一项旨在加强贸易和促进和平的全球战略。“海上丝绸之路”秉承了古丝绸之路的友好理念，要打造一条新路。它强调加强与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非洲的联系，打造一个由港口城市构成的网络。更重要的是，它致力于提高中国的地缘战略地位。中国由于海上争端而与一些东南亚国家关系不睦，借助复兴“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中国领导人意图为周边外交政策注入新的生命力，同时缓解紧张气氛。习近平重申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承诺，强调强大的中国将成为促进世界和平友好的力量，为亚洲和世界提供发展机遇，而不是构成威胁。

2015年5月5日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署名鲍盛钢的文章《“一带一路”构想堪称人类历史上第二次地理大发现》称，地图改变世界，是因为地图改变贸易线路，而贸易线路则改变财富流向与世界分工体系。地理大发现的意义不在于地理发现，而是在于商业贸易与经济发展机遇的发现。从这个意义上讲，习近平“一带一路”构想堪称人类历史上第二次地理大发现，它的最大历史意义在于它又将地球翻转了过来，令我们看到了已经沉睡了500年的欧亚大陆，更重要的是中国又回到了最显眼的地方。“‘一带一路’堪称中国大外交。其一，它是一个战略大框架，尽管是经济政策，但是良好的经济政策显然又是一个国家真正的大战略。其二，它的基础与美国马歇尔计划不同，它不是经济援助计划，也不是基于地缘政治考虑的结果，而是基于地缘经济与基于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全球产业分工体系，所以它不仅有利于中国自身的利益，也有利于‘一带一路’周边国家与地区的发展。其三，尽管它的基础在于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但是它将自然影响全球地缘政治结构与未来世界秩序的重建。”

“‘一带一路’战略将提振全球经济”

2015年4月15日美国彭博金融信息终端登载题为《中国循丝绸之路寻找促进经济增长良方》一文认为，习近平主席等中国领导人正聚焦于结构性的改革措施，如提升民营经济作用等。与此同时，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加强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经济纽带的宏大计划，以扭转海外对中国产品需求降温的趋势。

2015年4月20日美国《赫芬顿邮报》发表德国联邦议员菲利普·米斯菲尔德的评论文章《“一带一路”给全球经济送红利》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不仅有助于中国发展，还将提振全球经济。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GDP增长了30倍，经济发展经历了奇迹般的历程。如今，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为延续这一良好的发展态势，习近平提出了一个有助于中国保持和平繁荣发展的伟大构想，即“一带一路”战略。这一战略旨在将睦邻友好政策、和谐社会和中国梦的概念融合起来，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一带一路”将促进中国与中亚和里海地区国家的政治、经济合作，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事实上，“一带一路”战略不仅有助于提振中国经济，而且为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等中国的周边国家提供了全新的发展视角。习近平对巴基斯坦进行的国事访问，正式启动了这一计划。“一带一路”战略对全球经济的振兴也尤为重要。如果中国无法发展，全球经济增长都会停滞。

法国前总理德维尔潘2015年7月7日接受新华网独家访谈，说：“习主席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一个积极的能够动员相关地区人民而且具有创新性的时代战略。”巴基斯坦前总理阿齐兹表示：“在当前这个相互依存度相当高的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愈加紧密，‘一带一路’战略就是一个加强各国互联互通的，兼具地区和全球性特质的战略。”

“亚投行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

澳大利亚东亚论坛网站2015年8月4日刊登保罗·哈伯德的文章《中国引领丝绸之路》称，习近平倡议建立的亚投行主要任务是，为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提供资金。尽管“一带一路”听起来像是沉闷的对外政策口号，但它实际上是一项全方位的对外经济计划，亚投行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文章称，美国和日本都选择不当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部分原因在于担心亚投行会破坏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贷款标准，而这两家银行历来由美日主导。

2015年3月18日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北京接受凤凰卫视专访，针对美国在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态度问题发表了他的看法：“发展需要更多的资本，现有架构和新的架构的共存应该是有可能的。诸多事情应该有一个基本的国际体系，中美间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很重要。”2015年3月23日美国《福布斯》双周刊网站报道：“习近平提议设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就是一种最强大的软实力。美国曾表示不会加入亚投行，但现在就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也表示要与中国最新设立的这家银行进行合作。”

2015年3月26日英国《金融时报》发表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美国不应排斥亚投行》一文称，“英国选择成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创始成员国，此举激怒了美国。一些人将亚投行视为中国挑战世界银行计划的一部分。但这不等于说英国做出了一个糟糕的决定。相反，这个决定是合理的，尽管并非没有风险”。“当中国的提议对自身和世界都有意义的时候，接触比在一旁挑刺儿更明智。曾经有一位美国政策制定者要求中国做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创立亚投行正是在做‘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

2015年5月4日泰国《民族报》发表题为《从李光耀到亚投行：新秩序的黎明?》的文章，称有了东南亚国家对亚投行的支持，中国完全有可能在这个最新的多边银行中推进“亚洲道路”。

澳大利亚决定加入亚投行，被该国媒体认为是做出了正确的选择。2015年3月24日《悉尼先锋晨报》发表《澳洲终于做了正确的选择》一文称，“美国反对亚投行的原因恰恰在于亚投行总部设于中国，这会使得中国获得某些类似的机遇。然而，这并不能给我们任何不加入亚投行的借口。对东亚地区基础建设更多的投资对澳大利亚的工程师、建筑师、投资银行以及律师们而言都是好消息。我们仍想着商品出口，但澳洲的未来依赖于劳务输出。亚投行项目给澳大利亚提供去亚投行成员国的机会，我们可以通过以上提到的工作进行劳务输出”。

2015年3月29日《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上题为《世界聚焦中国“新丝绸之路”》的评论文章称，数百名各国与会代表都在仔细聆听习近平主席在博鳌论坛年会上的主旨演讲，尤其关注中国的“丝路战略”将会对自己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何种影响。习近平倡议的亚投行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该报还表示，中国所倡导的“丝路基金”已经引起了6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重视，同时亚投行的筹建工作也进行得有条不紊，中国的这两项倡议将为亚洲经贸和投资提供更多的机遇。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理论逻辑

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学习领会“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关键在于全面把握战略布局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进一步深化对党中央治国理政思路的认识，并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之中。

□ 宋福范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着眼于破解当代中国面临的复杂矛盾和问题，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思考后，郑重推出的重大决策。它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为解决当代中国问题进行的整体谋划，是重大的政策宣示，是推进工作的战略抓手。学习“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关键在于进一步深化对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思路的认识。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关键词是“布局”。“布局”的逻辑，构成理解这个问题的基本框架。布局，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全面安排”的意思，指的是行为主体着眼于破解复杂矛盾和问题，对构成一个系统的主要要素进行明确科学的功能定位，通过协调这些要素功能的发挥，力求达到整体效能，以便在实践中破解难题，推进系统正常运转。这样的安排就是全面安排，这种全面安排就是布局。可以看出，布局具有如下特点：其一，从布局自身的角度看，它面对的是复杂矛盾和问题，关注的是整体效能的发挥，谋求的是解决问题的最终结果。其二，从布局主体的角度看，它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实践活动，是行为主体对事物存在发展的理性认识在实践层面的展开和落实。其三，从布局要求的角度看，它从破解难题的目的出发，着眼于发挥要素的整体效能来审视要素的功能并提出要求。这些特点为我们认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框架。第一个特点可以帮助我们正确认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内涵；第二个特点可以帮助我们正确认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实质；第三个特点可以帮助我们正确认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给我们提出的要求。把握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内涵、实质和要求，就从整体上把握了这一重大决策。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内涵。“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为我们党对新形势下工作思路的全面安排，是针对十八大以来所面临的极其复杂的矛盾和问题提出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后，何以又将这四项任务整体推出？就在于面对着前所未有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不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就难以推进我们的事业的持续进行。改革开放以来，推动中国这样一个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我们走的是强政府推动市场经济的路子。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打开了财富的闸门，中国的财富爆炸式增长；另一方面，权力的不规范使用也导致了财富的分配不均。这些问题虽然是长期积累下来的，但是如果再不解决，将严重影响中国的健康发展。实践证明，这些问题单靠某一个方面的措施难以奏效，必须从整体性角度方能解决。“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应运而生。“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由整体性的特点所决定，要求对每一个“全面”进行清晰明确的功能定位，力求发挥其整体效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虽然是我们党着眼于破解十八大以来遇到的难题分别提出，但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仅仅是着眼于发挥每一个“全面”的效能的发挥，而是着眼于其取得“1+1+1+1>4”的整体效果，为此，通过科学定位每一个“全面”的功能，统筹其相互关系，使其发挥整体效能。正是基于这样的逻辑，“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定位为奋斗目标，将全面深化改革定位为根本动力，将全面依法治国定位为根本保障，将全面从严治党定位为根本保证，通过整体效能的发挥，破解长期积累的复杂矛盾和问题，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这就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内涵。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实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着眼于承载起解决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实现民族复兴这一使命，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和路径进行了不间断的接力探索，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路一以贯之的实践主题。这一大政策作为对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需求变化的回应，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到现在经历两个大的阶段的发展和变化。在20世纪80年代，着眼于满足人民群众生存型阶段把“蛋糕”做大以解决温饱的需要，我们形成了共产党领导的经济增长之路。这一政策在当时很好地解决了人民群众的吃饭问题，极大地满足了人民群众的需求，也获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整个社会进入发展型阶段，人民群众的需求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温饱问题解决以后，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政治诉求，过尊严体面的生活，成为需求的新内容。这种需求仅仅通过做大“蛋糕”已无法满足，必须进一步做好并分好“蛋糕”，这相应地要求我们的政策必须丰富和拓展。适应这一要求，党的十七大、十八大概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将其实质完善为共产党领导的科学发展之路。党的十八大强调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就是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科学发展之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道路问题是关系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这凸显了这一根本政策在其心目中极端重要的位置。经过十八大以来两年多实践探索和理论思考，这一政策着眼于破解当前的难题得以全面展开，这就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其中，走科学发展之路，当务之急就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解决这个问题必须破除利益集团的藩篱，这呼唤全面深化改革，解决“破”的问题，同时还必须适应社会转型的要求建章立制，按照现代社会的规矩办事，这就是全面依法治国，解决“立”的问题。而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解决“打铁还需自身硬”的问题，这呼唤全面从严治党。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要求。由“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整体性特点所决定，它对我们的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首先，它要求我们站在战略的高度上，以全局的视野、整体的思维，系统地抓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这四项影响全局的根本性工作，务求发挥其整体效能，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健康发展。其次，在上述这样一个总的要求之下，抓好每一个“全面”，力求使其发挥最大效能。如果说“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关键词是“布局”的话，它所包含的“四个全面”中的每一个“全面”的关键词则是“全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是我们根据中国社会进入发展型阶段人民群众的需求提出来的。适应人民群众过上更好生活的需求。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动力，是适应破解我们根据当代中国社会突出矛盾的要求提出来的。实践表明，要实现中国的科学发展，推进全面小康的实现，仅仅靠经济体制改革已经难以解决问题，要突破利益集团的藩篱，必须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党建等方面综合施治、辩证治疗方能解决问题。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保障，是适应中国社会日益进入现代社会的要求提出的。仅仅解决立法问题还不够，还必须从执法、司法、守法等环节才能建构我们所需要的法治秩序。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保证，是从中国共产党肩负的使命和时代对党的要求的角度提出的。在当代中国，一方面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另一方面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实现中国的科学发展，这是党的领导能否坚持的关键所在。因此，全面深化改革，既不能在重大问题上颠覆性错误，又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全面依法治国，既要坚持党的领导，又要走法治之路。把握这两者之间的平衡并有效地破解当前的各种难题，考验着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执政能力。把握好了二者的平衡，才能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

学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

推进全球经济治理体制变革的着力点

积极引导全球经济议程，推进全球经济治理体制变革，改革完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已经成为现阶段中国的重大国际战略选择。

□ 郭伟伟 王 浩

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理所当然地有着参与和改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愿望与诉求，希望在全球治理体制的变革中做出积极的贡献。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现有世界经济治理机制还存在若干严重缺失，缺乏公正性、公平性和代表性。比如，没有充分回应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新的诉求，占世界总人口七成以上的发展中国家拥有的国际话语权与自身及其对全球增长的贡献不相匹配。同时，既有全球金融治理中的治理责任分配矛盾，同样也难以在短时期内解决，新兴大国与传统强国间在全球治理责任分配上的冲突可能加剧。传统强国常指责新兴大国在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上采取“搭便车”做法；而新兴大国则认为其并不具备足够的国家能力执行全球规则。此外，现行的全球金融治理还存在若干责任性赤字，欧债危机暴露出来的问题已表明全球金融风险监管危机重重，单纯的国内监管无法控制全球性、系统性金融风险。

上述情况表明，现有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与机制越来越不能适应世界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需要，变革已经迫在眉睫。而对于我国来说，这场变革既是重要机遇，也是严峻挑战，需要我们准确把握、妥善应对。面对这一新形势，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积极采取有效措施，不断提高自身实力，努力增强参与能力，使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变革中处于主动地位。我们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下更大的功夫。

首先，中国参与改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本身就是一种极具现代性和挑战性的工作，并无先例可循，需要秉持“干中学”的态度。具体到政策层面，不仅需要鼓励按照“全面性、均衡性、渐进性、实效性”的原则改革国际金融体系，坚定释放长期、稳定、公平、可预期的政策信号；同时更重要的是，“十三五”期间要持之以恒地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力提升内力修为，提高金融业的全球综合竞争能力，高度重视完善法治建设和优化市场环境，充分凝聚中国上海和港澳台地区等全球金融中心力量，逐步增强全球金融定价权和资信评级能力，有序打造层次合理、功能互补的全球金融市场体系。

其次，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建设并不等同于要颠覆现有的国际机制，推倒重来，另起炉灶，而是改革完善，这就意味着中国有必要会同国际社会一起携手加强治理机制建设。这方面可供运作的空间是比较广泛的。如：有效推进国际金融机构治理形式创新，积极提升自身议程设置能力，参与制定与实施新的全球金融治理规则；灵活有效地强化建立多层次的全球或地区金融安全网络和合作安排；积极推进全球金融业监管标准和法规建设；扩大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金融治理机制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更加重视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关切，等等。此外，还应积极打造更具包容性的全球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

再次，中国参与推动世界走向真正的全球经济治理，应重视智库作用。中国需要加强智力储备，加强能力建设和战略投入，加强对全球治理的理论研究，高度重视全球治理方面的人才培养。要积极主动地通过人员访问交流、建立研究项目库、合作开发数据库、建立信息共享体系等方式推进全球智库合作网络的建设。

最后，在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进程中，不仅需要“干中学，干得好”，而且还要“会说话，说得好”，着力提升全球经济治理话语的塑造能力。良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声誉对于中国参与改善全球经济治理意义重大。现阶段我们需要加强话语塑造、有效传播和良性互动，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和精华，将其注入全球治理理念当中，为全球治理变革贡献智慧和力量；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发展，尽快供给更多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不断丰富传播形式，使中华文明蕴藏的相关治理经验和理念能更立体、更鲜活、更有效地传播，帮助国际社会更理性地认识和理解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

发展与现代化